

An Instance of the Rise of Rational Thinking in Ancient China

— On the Evolvement of Three-Foot Wine-Utensil and the Vocabulary with Niao-Zhu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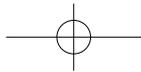
Zhang Fa

Abstract: The evolving line of wine-utensil in ancient China began first with Gui (鬶) of bird-shape and He (盃) of non-bird-shape in Taihu (太湖) area, and after that came to Gui-Zun (鬶尊) with bird-shape in Shandong (山東) area and He (盃) with non-bird-shape in Jiangnan (江漢) area, then getting interaction with You-Zun (酉尊) in Northwest area, finally became the Ji-Yi (鷄彝) in Erlitou (二里頭) culture of the Xia Dynasty. It contains two issues: one of them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wine-utensil's shape and that of the local area's cultures and the other is how to give correct names to those different wine-utensils. The names of Gui (鬶) and He (盃) were given by archaeologists, while Gui-Zun (鬶尊) and He (盃) are new names decided upon according to these characters' ancient meaning and the shape of the utensils designated. To gain a clear view of their development, the wine-utensils with three feet discovered in the Southeast must be studi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You-Zhuen (酉尊), not of the three-feet style) of the Northwest. After taking You-Zun (酉尊) into the picture,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 evolvement of wine-utensils had been a result of constant cultural interactions. Coming along also with this cultural interaction is the development of rational thinking in ancient China, which is shown in the forming of words based upon character parts such as Niao (鳥) and Zhui (隹). Therefore, by analyzing the structure and evolvements of the words in ques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would be well mapped. The two characters Niao (鳥) and Zhui (隹) in the beginning had the same meaning both referring to bird by having a bird-shape. Later, they evolved toward different directions. Compound characters built around the character part Niao (鳥) retained the original bird shape and bird-related meaning, while characters formed around Zhui (隹) fall into two categories: one kind of them keep to the bird meaning, such as Yan (雁), Que (雀), Diao (雕), etc., while the other kind no longer have any direct connection with birds as can be seen in such characters as Ya (雅), Yong (雍), and Juan (雋).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s derived from Niao (鳥) and Zhui (隹) would enable us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ed wine-utensils. These characters and wine-utensils also provide us with a cl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ational thinking in ancient China. Examined in light of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se relevant characters, the three-feet wine-utensil would have its aesthetic value better appreciated,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dispute as to the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Niao (鳥) and Zhui (隹) sinc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might also be solved.

Keywords: Wine-Utensil with Three Feet; Wine-Utensil Named Gui-He (鬶盃); Gui-Zun (鬶尊); He (盃); Ji-Yi (鷄彝); Compound Characters Constructed around Niao (鳥) and Zhui (隹)

Author: Zhang Fa earned his BA from Sichuan University in 1982, MA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n 1984. He was a visiting scholar at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in 1995, at Harvard University from 1996 to 1997, and at Toronto University for the 2002—2003 academic year. In 2005, he was elected to be Special Term Professor in Changjiang Scholars Program. He is now a professor a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a member of Disciplinary Review Group of State in Philosophy and a vice-chairman of Chinese Aesthetics Society. His academic interest covers aesthetics, aesthetic culture and history of ideas. His published writings mainly include: *A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 *Chinese-Western Aesthetics and Their Cultural Spirit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esthetic Principle between China and West in 20th century*, *The Chinese Discourse of Aesthetics*, *Chinese Philosophy toward the Globalization*.





遠古中國理性思維生發之軌迹

——以三足酒器和“鳥”“隹”語彙的演進為線索

張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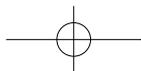
[摘要]遠古中國的三足酒器，從太湖地區的似鳥形的鬶和非鳥形的盃，演進到山東地區鳥形突出的鬶鸛和江漢地區的非鳥形突出的盃鬲，然後，二者與西北地區的酉尊互動，而演進到夏朝二里頭文化的鷄彝。這一演進歷程異常複雜，包含了兩個方面的難題：一是器形演進的邏輯和與之相關的文化演進的邏輯，二是三足器在演進中的不同類型在古代的命名問題。所謂“鬶”“盃”，是考古學界的命名；所謂“鬶鸛”“盃鬲”，則是根據文字古義和考古器形內容做的新命名。從東南興起的三足酒器的演進，祇有與西北的非三足的酉尊相關聯，其內在邏輯纔得以彰顯；把酒尊加進來之後，三足酒器的演進，構成了遠古時期幾大文化的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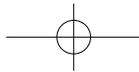
動。這一互動所關聯的歷史演進，與遠古中國原始思維向理性思維的演進相伴隨。而這一思維的方式演進，又在後來的古字中體現出來。三足酒器的鳥形，與後來古字中的兩個與鳥相關的部首——“鳥”“隹”——相關聯。因此，分析“鳥”“隹”的演進，遠古思維的邏輯演進可以更清楚地呈現出來。這體現在以“鳥”為主的字和以“隹”為主的字從內在统一到詞義分開。最初，“鳥”與“隹”同義，都是鳥的自然形態和宇宙本質內容的統一。在觀念的演進中，鳥的自然形態與宇宙觀念內容開始分離，以“鳥”為偏旁的字完全保留了鳥類的自然形態，祇要以“鳥”為偏旁，都與鳥相關。而“隹”字則產生了分離，可以與鳥相關，這是其原初形態的保留，如“雁”“雀”“雕”等等；也可與鳥完全無關，但成為文化中具有關鍵作用的概念，如“雅”“雍”“雋”等等。理解了“鳥”與“隹”的演進，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三足酒器的演進。文字和酒器這兩種東西所內蘊的文化內容，都與中國遠古思維從原始形式向理性形式的演進相關。把酒器與文字關聯起來，三足酒器的審美外形後面的觀念內容就得到了更好的理解。同時，自《說文解字》以來，關於“鳥”與“隹”的討論，也可以在文化層面得到更好的解決。

[關鍵詞] 三足酒器 鬶盃—鬶鸛—盃鬲—鷄彝之酒器 鳥字語彙 隹字語彙

[作者簡介]張法，1982年在四川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1984年在北京大學獲哲學碩士學位，1995年在賓州州立大學、1996—1997年在哈佛大學、2002—2003年在多倫多大學做訪問學者，2005年被中國教育部遴選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現為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中華美學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美學、審美文化、思想史研究，代表性著作有《中國美學史》《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20世紀中西美學原理體系比較研究》《美學的中國話語》《走向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哲學》等。

4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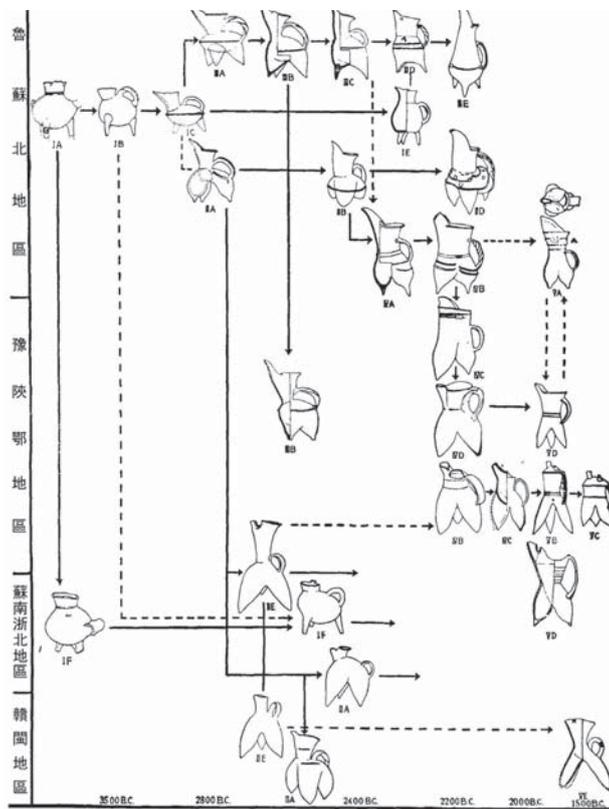


遠古中國在思想觀念上的演進，是從原始思想中事物之間有本質關聯，到理性思維中沒有本質關聯。這一觀念的演進，可以在各種各樣的器物和文字上體現出來。而在器物上的一個重要現象，就是從各種動物形象變成非動物形象，即從動物形象與非動物形象有本質上的內在關聯，到沒有本質上的內在關聯。而這種演變關聯及其分離，在三足酒器的演進和與“鳥”相關的文字的演進中顯得十分突出。

一 遠古酒器的器形演進與觀念演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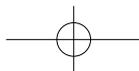
遠古中國的酒器演進，最初分別產生於東部、西部、南部，最後三地交匯於中原。在西北部，產生了尖底瓶的酉器，酉器演進為酒器，由酉器再提升為尊器。“尊”不但是作為禮器的酒器名稱，而且成為所有祭祀禮器的泛稱，還成為文化中重要觀念的名稱。在東南部太湖文化的飲器中，產生了平底之盃和三足之鬶；被名之為“鬶”的具有鳥之器形，名之為“盃”的鳥之器形不明顯，進而也升高與鬶一樣成為三足酒器。考古學者以鬶盃皆成為三足器為基礎，認為鬶盃兩形基本不分或難以分開，兩種二而一又一而二的器形進一步演進，一是從太湖地區到山東地區，器形似鳥之鬶得到了極大的強化。這在高廣仁、邵望平的文章《史前陶鬶初論》“陶鬶（盃）源流關係示意圖”^①、呂琪昌的著作《青銅爵、斝的秘密：從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的起源並斷代問題研究》“海岱系統陶鬶淵源及概略發展狀況示意圖”^②（見圖一）中，都有鮮明的體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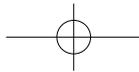
圖一 海岱系統陶鬶淵源及概略發展狀況示意圖



① 高廣仁、邵望平：“史前陶鬶初論”，《考古學報》4（1981）：451。

② 呂琪昌：《青銅爵、斝的秘密：從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的起源並斷代問題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第100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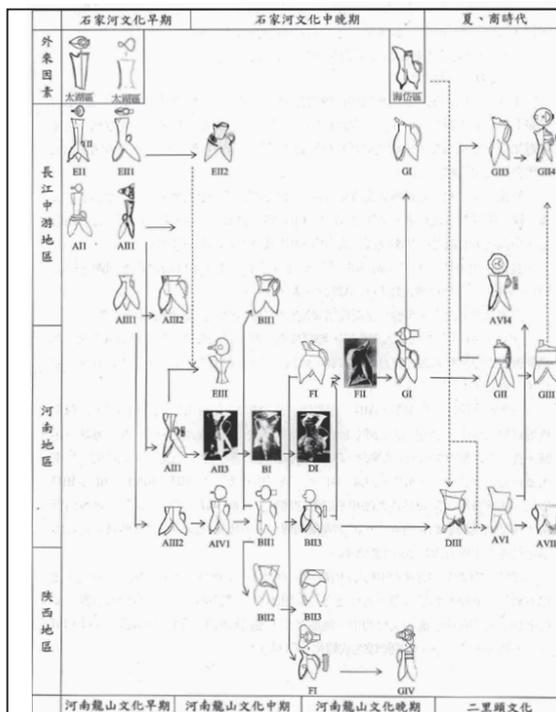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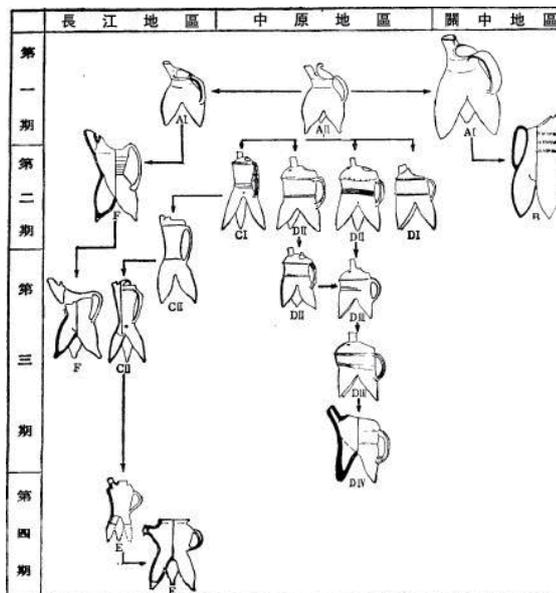
山東地區在三足酒器上偏重於鳥形突出，如果要將之與太湖地區的鬶盃相比較的話，不妨加一個更加突出鳥的名稱在“鬶”字之後，稱為“鬶鷓”。這裏的“鷓”，當然是在與西北地區的“西尊”互動之後產生出來的。但祇有在與西北之西尊的比較中，鷓之鳥形纔特別突出。而“尊”與“鳥”可以合在一起而為“鷓”，反映出處在原始思維中非鳥形的西尊與鳥形的鬶鷓具有內在的同一性。太湖地區的鬶盃進入江漢地區，被彰顯的不是鳥形的鬶，而是非鳥形的盃，這在“中原系統主要陶鬶盃源流關係示意圖”^①（見圖二）中體現得較為清楚。

長江中游和江漢地區的三足酒器，盃的非鳥特徵加強而鬶的鳥形特徵減弱。既不同於山東地區的鬶鷓，也不同於太湖地區的鬶盃，且可命名曰“盃鬶”。正如山東地區的鷓，是在與西北西尊的互動中產生，江漢地區的鬶，同樣是在與西北地區的西尊的互動中產生。“鬶”中的“西”強調酒器功能，“鬶”則強調其與西北之鬶一樣的三足。東方的鬶鷓，南方的盃鬶，與西方的西尊在中原交匯互動，最後產生了“二里頭文化”的三足器，考古學上命名為“封頂盃”，文獻上命名為“鷓彝”。之所以叫“封頂盃”，是在於與山東地區鳥形明顯的鬶鷓比較，特別是從平視角度看，具有非鳥形的特質。之所以又叫“鷓彝”，是在於與江漢地區的非鳥形明顯的盃鬶比較，特別是從頂上之管，又稍多鳥形特徵。“鷓彝”之名，“鷓”字鳥形特徵明顯，“彝”字鳥形特徵隱蔽。“鷓彝”這一複合詞組，正好適宜一種觀念的綜合表達。鷓彝這種綜合，也可視為一種新的創造。因此，杜金鵬在《封頂盃研究》一文中認為，這種三足器是在河南興起而又擴散到其他地區，是一個獨立的酒器體系（見圖三）。^②

圖二 中原系統主要陶鬶盃源流關係示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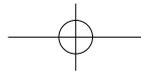


圖三 封頂盃起源和演變示意圖



① 呂琪昌：《青銅爵、斚的秘密：從史前陶鬶到夏商文化的起源並斷代問題研究》，第94頁。

② 杜金鵬：“封頂盃研究”，《考古學報》4（1992）：11。



以上三張圖，基本呈現出，在遠古中國，三足酒器在四大地區有不同的類型。但觀察這些類型，無論是鳥形明顯的鬶，還是非鳥形的盃，或在鳥與非鳥之間的鬶盃和鷄彝，其內在本質的互通性是明顯的，正如其外在的差異性是突出的一樣。如何在這一致性與差異性中瞭解三足酒器的演進呢？這就要從三足酒器演進到考古學上的“二里頭文化”後所取得的名稱上去考察。

二 “鷄彝”之名後面的觀念張力

《禮記·明堂位》曰：“灌尊，夏后氏以鷄夷。”孔穎達疏曰：“夷即彝。彝，法也。以餘尊為法，故稱彝。”^①孔疏實際上講了兩點：鷄是外形，彝是內容，兩者統一在夏代的三足酒器之中。這就透露出了，三足酒器從產生之初的鬶盃始，到鬶彝和盃彝的不同演進，再到鷄彝的最後整合，一直處在多重張力之中。在太湖地區，有鬶與盃的張力；在演進之中，有東方的鬶彝和南方的盃彝之間的張力；進入“二里頭文化”，又有鷄與彝之間的張力。鷄彝的內部張力，從來源上講，是三足酒器在起源時期的鳥與禾之間的張力。由以太陽之鳥在一年中的東升西落為核心的“鳥”來象徵宇宙的觀念，和由莊稼之禾在一年中的春種夏長秋收冬藏為核心的“禾”來象徵宇宙的觀念，在偏重或強調某一形象時，產生了器形的區別。在這一張力中，鳥與禾既內在地互滲一體，又在現象上分別為兩個不同因素。鳥與天地四季的運轉相關，代表天道；禾與莊稼的春夏秋冬的循環有關，象徵地道。

在遠古中國，翟鳥崇拜普遍存在，翟即鷩（是《說文解字》中“銜矢射人”的神鳥）即鷩鷩（即《東京賦》講的“虎夫鷩鷩”），象徵的是勇猛和刑殺^②，是天道中的陽剛一面；而禾則展示平和的生長與收成的欣喜，以及以禾為料釀成酒之後的樂歡，彰顯的是天道中的陰柔的一面。當“大汶口文化”中的三足器以鳥形為主時，意味着文化中鳥與禾的張力中在鬶彝型三足酒器上的體現，是以陽剛刑殺為主，以陰柔的溫和為輔。當江漢的三足器以非鳥形為主時，內蘊着鳥與禾的張力中，在盃彝型三足酒器上的投射，是以陰柔的溫和為主，以陽剛刑殺為輔的觀念體系。在“龍山文化”時代，東西南各民族的互動而進入“二里頭文化”之時，三足酒器成為鷄彝，透射出的是對鳥與禾張力的新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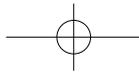
從上古史的整體演進看，各族群進入“龍山文化”的融合中，各方之鳥在以鷩為核心向鳳凰演進，而鷩之形象也在多方調適中具有了對各種品性的包容性。正如韓嬰（約前200—前130）在《韓詩外傳》卷二所講：“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鷩有五德也。”鷩的文、武、勇、仁、信五德，與由禾與天道相連而來的性質已經有了更大的重合。許慎（58—149）的《說文解字》釋禾曰：“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雖然鷩有武勇兩德都強調刑殺，而禾特彰顯生的力量，但在天地運轉最關鍵的“時”上高度重合。鷩為“知時之鳥”，禾乃“得時之中”，因此，當“大汶口文化”中以鳥形為主要器形的三足酒器演進到“龍山文化”以鷩名為主要符號的三足酒器時，翟的刑殺得到了新調適，禾的生德被予以了新強化，鷩的形象已經把二者的內容包括在其中了。因此，以鷩形象為主的鷩彝的出現，體現的正是以“夏”為核心的多元一體的新時代的到來。

對於夏文化中的鷩彝，杜金鵬的《封頂盃研究》祇是把關注重心放在鷩彝上，突出這一獨特酒器起源於龍山文化晚期的中原，雖然也講是中原與各地區的互動，但祇是一筆帶過，而主要內容是講鷩彝在中原產生之後，再傳向今黃河上游的陝甘寧，上至成都下至上海的長江上下，以及河北和遼河地區。他的“封頂陶盃演變圖”包含兩個內容，即鷩彝一是在器形上、空間上的展開（主要是中原、江漢、關中地區），二是時間上的延續為四期。第一期約公元前2400—前1900年，

^① 李學勤主編：《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中冊，第946頁。

^② 王小盾：《中國早期思想與符號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上冊，第507—508頁。





第二期約公元前 1900—前 1700 年，第三期約公元前 1700—前 1500 年，第四期約公元前 1500—前 1100 年。跨度從龍山文化到夏商兩朝。鷄彝從中原的龍山文化產生出來演進到二里頭文化後，杜金鵬發現，二里頭文化早期鷄彝向周圍地區的傳播軌迹，在上古大地上的分佈，與古籍中“禹迹”的分佈恰好是重合的。因此，鷄彝成爲夏代的標誌性器物。然而，鷄彝之名其實包括兩個部分：一是鷄指三足器所象徵的具體鳥類；二是彝，指包括鷄在內的所有神鳥，包括所有鳥神在內的神聖動物，以及包括所有神聖動物在內的一切神物。因此，鷄彝內蘊着作爲特殊的鷄與作爲一般的彝的張力。從鷄去理解彝，可體悟鷄在中原文化中的特殊意義；從彝去理解鷄，可知曉彝在夏文化中的普遍意義。正因爲鷄的特殊性，當夏被商取代後，鷄彝作爲灌尊的地位就被罍所代替了。在這時代變更中，鷄被否定了，彝卻保留下來。鷄彝作爲器形，在商周時期的演進，成爲青銅盃。盃之名出現時，管流從鷄彝的頂部下移到器之腹部。但承傳關係仍然明顯。由自銘的青銅盃向上追溯，目前發現的有自銘的商周青銅盃形器，各期名稱參見表一所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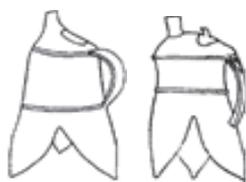
表一 商周青銅盃形器各期名稱

自銘	彝	尊彝	寶彝尊	寶彝	宗彝	從彝	宗尊	寶盃	寶彝尊	尊盃	盤盃	盃	旅盃	寶盤	盞
时代															
商代晚期	2	3													
西周早期	4	8	5	1	1	4	1	1				3	3		
西周中期	2	2	2	2				5	1		1	5	1	1	3
商代晚期								2		1	2	6			

註：本表根據李雲朋《商周青銅盃整理與研究》（碩士論文，陝西師範大學，2011）資料製作。

從表一中可見，中原龍山文化出現的三足酒器在商代晚期稱爲彝或尊彝，西周早期也還是以彝或尊彝爲主；到西周中期，盃之稱纔在數量上超過彝之稱。聯繫到文獻中夏后氏用鷄彝，似可說，龍山文化晚期到夏稱爲鷄彝，商祇稱爲彝或尊彝，周纔開始稱爲盃。回想到三足酒器產生之初鳥與盃的相對關係，將之來看夏、商、周從夏之鷄彝到商之寶彝再到周之盃的演進，又正與夏商在刑德中以刑爲主，西周纔轉爲以德爲主相應合。

圖四 夏代鷄彝(器頂管流盃)



圖五 商代宗彝(器頂管流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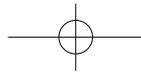


圖六 周代盃(器腹管流)



資料來源：前四器，見杜金鵬《封頂盃研究》；後一器，見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

把三足酒禮器的演進大綫向後延伸：從中原龍山文化到二里頭文化的夏，是鷄形在明顯和不明顯之間的鷄彝；到了殷商，是鷄形消退而彝形明顯的三足酒器（正如後來定型的“彝”字已經看不出鷄在其中）。這樣，三足酒禮器在二里頭文化中，有的可感到象鷄形，負載的是鷄的觀念；有的感不到象鷄形，內蘊的是彝的觀念。從鷄彝的俯視圖的多義性和“彝”字字形的多義性，透出的和內蘊的正是遠古觀念從西北地方之西尊器和太湖地區的鬶盃開始以來的複雜演進。這一複雜演進的核心內容，在考古器物 and 文獻上難以清晰地呈現，但卻從與“鳥”相關的文字中透露出來。



三 從“鳥”“隹”文字演變看遠古酒器演進的觀念內容

在三足酒器的整體演進中，從大汶口文化的鳥形器向二里頭文化鷄彝的演進是一條主綫，它與遠古中國觀念體系演進的重要方面緊密相關，王小盾把《說文解字》以及從《玉篇》到《康熙字典》照抄《說文解字》的辭書所呈現的“鳥爲長尾、隹爲短尾”的區分運用到遠古東西部鳥觀念的不同上，從新石器的鷄彝灌禮講到商周青銅鳥紋，呈現了一個大的框架。簡括言之，有如下三點：第一，東夷各族包括大汶口文化在內是隹一類的短尾鳥，來自大汶口後北上又南下中原的商是隹、雀等短尾鳥。第二，廟底溝文化中是翟雉型長尾鳥，繼而由跋鳥向三羽、九尾轉變；到夏代，形成三羽冠和九尾鳥；在此基礎上，形成周代的長尾鳳鳥。第三，關聯到從大汶口文化的鳥型酒器到二里頭文化的鷄彝，則是來自西方的長尾之鷄與來自東方的短尾之隹的交流而成。^①王小盾把問題提到關節點上，但在進入時把問題簡單化了。

對於《說文解字》把“鳥”與“隹”作爲長短尾區分的定義，羅振玉（1866—1940）曾根據甲骨文資料從現代學術立場作了批評：“卜辭中‘隹’（許訓短尾鳥者）與‘鳥’不分，故‘隹’字多作‘鳥’形。許書隹部諸字亦多云‘籀文從鳥’，蓋‘隹’‘鳥’古本一字，筆劃有繁簡耳。許以‘隹’爲短尾鳥之總名，‘鳥’爲長尾禽之總名。然鳥尾長者莫如雉與雞，而並從隹；尾之短者莫如鶴、鷺、鳧、鴻，而均從鳥。可知強分之，未爲得矣。”與羅振玉同時代及以後的文字學家幾乎都從現代漢語原則支持羅的說法，丁佛言（1878—1931）、高鴻縉（1891—1963）、高明等以不同程度和方式支持“鳥”“隹”是一字；高田忠周、馬敘倫（1885—1970）、裘錫圭等從不同方面講“鳥”與“隹”相通，饒炯（1884—1935）、商承祚（1902—1991）等贊同以尾之長短強分“鳥”“隹”，未爲得矣。^②其實，雖然如現代學人批評的那樣，許慎未看到甲文金文中“隹”的字形有長尾，但《說文解字》鳥部、隹部中的諸字之字形及釋義已經呈現出鳥隹在長短尾上有交叉。因此，深知古代漢語原則的清人段玉裁（1735—1815）在《說文解字註》中爲之辯解曰：“短尾名隹，長尾爲鳥，析言則然，渾言則不別也。”^③值得注意的是，既然許慎知道“鳥”“隹”在長短尾上有交叉，爲什麼還要強爲分別呢？原因在於，一方面，許慎去古未遠，以一文字大家的直覺，強烈地感受“鳥”“隹”二字在相同的同時，還是有根本區別的；另一方面，背景去古已遠，已經無法理清這一區別究竟爲何，因此巧借古代漢語渾言析言原則，提醒學人注意，這裏有區別。當從遠古鳥觀念的演進來看“鳥”“隹”的同異，問題就清楚了，而且這一問題正好與三足酒器從大汶口文化向龍山文化向二里頭文化的演進密切相關。

“鳥”與“隹”究竟區別在哪裏呢？

在遠古社會的思維方式和觀念體系裏，鳥既是自然中的鳥類本身，又與天地萬物相連，內蘊着天地的本質；在由原始向理性的演進中，作爲自然的鳥與天地本質之間的區別逐漸呈現出現。體現在文字上，鳥類以保持鳥的自然外貌爲主，因此，《說文解字》鳥部一百二十一字，全都以鳥的自然形態爲主組織起來，而有“隹”的字則被分散到各類部首之中，祇有與“鳥”相關的三十八字被保留在隹部。而後來那些以“隹”爲基礎，但詞義與鳥無關，或則雖然表面有關，但已經用於抽象的觀念的字，恰好透露出遠古“鳥”“隹”一字或“鳥”“隹”相通時的古義。

“隹”還保留着遠古儀式中以鳥爲形以神爲質出現的字有：

魑：鬼即神，這裏神的外形是隹。《說文解字》：“神獸也。從鬼隹聲。”北斗七星之一的天璣星名，是以隹爲外形之鬼（神）。

隹：《說文解字》“𠃉隹，醜面。從人隹聲”，應是人鳥合一的怪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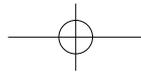
雉：《說文解字》“姿雉，姿也。從女隹也。一曰醜也”；段玉裁註：“恣也……縱也。”應

① 王小盾：《中國早期思想與符號研究》，上冊，第507—532頁。

② 李圃：《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4冊，第83—85頁。

③〔清〕段玉裁：《說文解字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48頁。





是女性之人與鳥合一的怪相。

儼：從《詩經·衛風·竹竿》毛傳透露出，最初應為（人扮的）難鳥在儀式中行走姿勢的優美有度，到《周禮》《論語》已經演變為朝廷和鄉里與季節有關的驅鬼儀式的威猛怪異的儼面。

佳與其他動物合一的形象有：

雌：《說文解字》“如母猴，印鼻，長尾。從蟲佳聲”，就為是佳與猴合一的形象。

犛：也作“犛”，《說文解字》“牛息聲。又牛名”，應是雙鳥與牛合一的形象。

上面諸字，仍保留有鳥一佳的原始內容。最為重要的，是以“佳”為基本構成，但已經脫離了鳥的形象而成為具有普遍觀念形態的字。這些在政治和美學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字有：

雅：《說文解字》“楚鳥也。一名鷲”，是雅的自然鳥貌；鄭玄《詩經·小雅》箋曰：“雅，萬舞也。”是雅的遠古儀式內容。鄭玄註《周禮·春官·大師》、邢昺疏《爾雅》《玉篇》釋雅，皆曰：雅者，正也。是鳥類和遠古儀式分離之後的觀念。

雍：《說文解字》“雝【鳥離】也”，是鳥的原貌。《水經》曰：“四方有水曰雍。”是為儀式地點形狀。《玉篇》曰：“雍，和也”；《集韻》曰：“雍，佑也”，成為普遍觀念。雍和境界、雍容大度，成為高級的政治和美學語彙。

護：護即“護”“濩”，《呂氏春秋·古樂》《周禮·大司樂》商湯之樂為《大護（濩）》。護，最初應是儀式中人鳥合一的舞樂。按：音同義通，護者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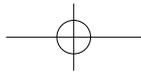
珣：《集韻》“與瑯同。鸚瑯，鳥名”，是自然之鳥貌；《說文解字》“石之似玉者。從玉佳聲”，應是“鳥”“玉”在儀式中的結合。珣一瑯在儀式中的形象，達到與玉同美的效果。

雋：《說文解字》“肥肉也”，段玉裁註曰：“肉肥也……味美而長也。惟野鳥味可言雋。”蓋由與鳥相關的儀式中的肉美而來，以後在鳥佳分離中升華為普遍性的美：雋味、雋語、雋永、雋蔚、雋壯、雋潔、雋德……

雝：《說文解字》“五彩相會”，最初應是儀式中多鳥彙集，羽毛五彩而美。因此，雝即儼，以三“佳”疊加表其多，段玉裁註“久之改儼為佳”，應有遠古美學之根據。加上上衣之後為“裸”，段玉裁註“《詩》言裸佩，謂集玉與石為佩也”，應是後來的形象演進，但本義不變。

“佳”不僅由遠古儀式以“雝”為核心的鳥人一體之神，演進為理性王朝之華夏衣冠之雅，形成了雍和雋德的境界，而且演進為一系列中國文化基本觀念的詞彙，“雄”“雌”也成為禽獸與人通用的具有普遍性的性別之分。“隻”“雙”成為計數上具有普遍性的一和二，還有“離”“離”，既是三又有多之義，有着《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內涵。雝、隻、離成為抽象的尺度之詞。“準”成為普遍性的標準；“確”成為普遍性的肯定；“衢”成為四通八達的道路；“維”成為普遍性的基礎，《管子·牧民》“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懋”“歡”“難”成為人類的心理狀態，《說文解字》釋“懋”曰“敬也”，釋“歡”曰“喜樂也”，《廣韻》釋“難”曰“患也”；“推”“擁”“攬”，成為基本與鳥無關的人的動作；“觀”“矚”“瞿”，皆從鳥眼之視轉為人眼之貌；“堆”“灘”，成為與鳥無關的地理形態；“帷”“錐”，成為與鳥無關的人類器物……

從“佳”在脫離鳥的性質而向文化各基本方面的擴展，透露出的是遠古時代佳鳥一體的觀念體系在時代演進中的變化。在仰韶時代一大汶口時代，人們共有鳥佳一體和鳥佳與天地一體的觀念體系。但是，相對而言，東部文化鳥一佳觀念處在文化的中心，《左傳》昭公十七年（前525），郟國的國君郟子在與魯昭公的對話中講到，在上古“少皞氏”時代，社會管理是以各種鳥官進行的：“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鵙鳩氏，司空也；鷓鴣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鳩，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鳳鳥、玄鳥、伯趙、青鳥、丹鳥，以及五鳩、五鳩、九扈，是一個複雜而又有序的鳥的體系，這也從大汶口三足鳥形酒器的體系性上彰顯出來；而西部文化鳥一佳觀念並未處於核心地位，這從



由羌姜文化而來的“羊”字系列中透露出來，也從仰韶彩陶上的魚鳥互動圖案中透露出來，還有從仰韶尖底酉器中透露出來。當大汶口文化與廟底溝文化進行大範圍互動而走向龍山文化的過程中，產生了三大變化：一是鳥一佳的神鳥上的整合，開始了中國之鳥走向鳳凰的歷程；二是“鳥”與“佳”的分離，開始了中國遠古思維的理性化進程；三是酒禮器的整合，產生西方之酉尊、東方的鬶、南方的盃，在互動中向鷄彝的轉變。而這一轉變雖與兩種器形在大汶口（乃至從河姆渡開始）的內部互動有關，但更主要是與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的互動，最後在中原龍山文化中產生鷄彝。可以說，這一轉變與觀念體系上“鳥”與“佳”的分離緊密相隨。鷄彝在器形上，平視有象鷄的類形，又有不象鷄的類型；俯視有像鷄的一面，又有不像鷄而像神或其他物象的一面。這一觀念內容在文字上的表現，可以從不少重要的字，既從鳥又從佳中透露出來：鷄一雞，鷓一雞，鷓一雞，鷓一雞，鷓一雞，鷓一雞，鷓一雞，鷓一雞，鷓一雞，鷓一雞……在眾多的“鳥”“佳”同字中，“鷄一雞”突出地關聯到東西文化互動中在觀念體系和酒器器形上的演進。

當由“佳”字代表的以抽象觀念為主的語彙，從由“鳥”字代表的以自然形象為主的語彙，在文字上完全區別開來之時，遠古中國從原始思維向理性思維的演進就完成了。通過這一完成後的結果，再回看三足酒器從太湖文化到二里頭文化的演進，其內容和方向是什麼，就較為清楚了。

